

■对 话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傅 菲：写普通人的生命光辉，就是我的“人间珍贵”

□本报记者 杨茹涵



傅 菲

这一切都不可重来，都值得深爱

记 者：傅老师好，祝贺您凭借《人间珍贵》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您从事乡土与自然题材写作多年，已出版《深山已晚》《元灯长歌》等30余部散文集。相较于之前的写作，您觉得《人间珍贵》在写作重心、叙事视角与精神表达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傅 菲：我从2002年开始写散文，是单一文体的写作者。我喜欢在乡野生活，与村人一起劳动，一起种树、建亭子。我与我笔下的人物一起生活。他们是唱串堂的乐师，是挖藕人，是建筑工地的打井师傅，是重病患者，是乡间书店开办者。他们是普通劳动者，一生平凡。他们努力生活，物质也不是很富裕，但他们的生命熠熠生辉。我写他们的艰苦，也写他们的不屈精神以及身上的暖意。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底色。我讴歌他们，讴歌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构成了人间。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份子。

相较于2021年出版的《元灯长歌》，《人间珍贵》的写作重心更倾向于将普通民众的个体生命史与村庄的变迁史相互融合。从社会学视角看，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往往与村庄的变迁史乃至我国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重叠交织。我试图通过一个人物书写一个村庄的当代史，以此勾勒乡村的演进脉络。在叙述视角上，《人间珍贵》大部分篇章从社会学、人类学切入；而《元灯长歌》则在长叙事中以地域史视角展开。二者的精神表达亦不尽相同：《人间珍贵》聚焦于普通民众的生命历程，着力展现他们身上散发的生命光辉，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不屈意志。正是这些平凡而坚韧的人们，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底色。

记 者：《人间珍贵》这个书名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您为什么会想到用它做书名？

傅 菲：“人间”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词——它离我们的情感最近，离柴米油盐、悲欢离合最近，是我们每一个人实实在在生活于其中的场域。而“珍贵”，则源于生命本身的质地：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单向旅程，不会有返程，就像一列永不回头的列车，每个人都奔向自己的终点，却无人预知它何时到站。这份未知，恰恰是生命最大的魅力，也是它最值得被珍惜的理由。

之所以用这个书名，是因为我始终觉得，生命需要像稻穗接受灌浆那样，从生活中汲取养分，而“珍贵”正是这种滋养的最终答案。我们在人世间感受过的每一份温情、承受过的每一次痛苦，最终都会沉淀为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之所以为“我”的印记。所以，人间之所以珍贵，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对生活、对人的热爱——热爱身边的人，热爱平凡的日子，热爱这

片养育我们的土地。

今天的“我”，是以往所有“我”的总和。这本书，是我献给时代的祝福，献给每一个劳动者的祝福，也是献给脚下这片土地的祝福。我们或许过着普通的日子，但普通不等于贫乏，不等于可以被忽略、被忽视；我们同样拥有丰沛的生命力，同样能在属于自己的生命场域实现自我的价值。人间的珍贵，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我们认真活过的每一个此刻——因为这一切都不可重来，都值得深爱。

有些东西，写出来是为了不要忘记

记 者：为了创作这本书，您走访了江西灵山山脉和大茅山脉腹地的许多偏远山区，细致记录乡民收入、人口迁徙、风俗习惯等内容。这种“必须抵达现场”的创作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在长期下乡走访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更加坚定了这条路？

傅 菲：2013年7月，我前往福建浦城县荣华山下定居生

记 者：您是在什么机缘下开始接触这些乡村人物的？第一次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时，和您预想的有什么不同？

傅 菲：上饶市枫林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我16岁考入上饶师范学院，之后在外读书、工作多年。45岁起，我又以村民身份回到这里生活（大部分时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草籽终归要落回土里，才能长出草芽；风吹草叶，草结草籽。至于第一次走进他们生活时与预想有何不同，其实我没有太多预设。乡村于我而言不是异乡，而是归处，所以更多是重逢与发现。

记 者：书中写了许多丰富多彩的人物，如果您选一个让您最“放不下”的人，会是哪一个？您能讲讲他的故事，以及他为什么一直留在您心里吗？

傅 菲：我写了许许多多的乡村人物，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让我挑选一个最“放不下”的人，这确实困难，因为每一个笔下的人物，都与我有着一种“温度”关系——我们之间有情感上的粘连。这些年，我实地走访过数百个村落，访问过很多山民与乡邻。2023年10月，我去了上饶市华坛山镇黄土岭。



傅菲部分作品

田棚自然村只住了两户人家：一户是一对年过八旬的夫妻，另一户是一对年过花甲的夫妻（户主姓徐）。徐老哥以养蜂、卖山茶油为生，面色蜡黄；他的爱人因年轻时做过手术、伤了神经，自理能力减弱了许多。我在他家坐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我将黄土岭写进了《野溪谷》。他们让我感受到了生命深处那种无法停止的疼痛。有些东西，写出来是为了忘记；有些东西，写出来是为了不要忘记。

用客观的方式来描写事物

记 者：您在《人间珍贵》中写的是茶人、卖菜者、灯笼匠人等普通人，没有刻意渲染苦难，反而更关注他们在困境中透出的坚韧和善意。您在挑选书写对象时，通常会考虑什么？

傅 菲：我在挑选写作对象时，通常会考虑几个因素。一是地理因素，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孕育出不同的地域文化。二是题材的广度，主要体现在人物所从事的行业、性别、年龄，以及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三是人物所生活的村落，我会特别关注人与自然、人与村庄之间那种微妙而深厚的关系。

记 者：这本书中的很多人物都说着地道的乡音方言，他们的故事本身也很朴实。您在把他们整理成文字时，是怎么把握“记录”和“表达”之间的分寸的？

傅 菲：这本书中确实有一些地方使用了乡音方言。我之所以少量运用方言，一是为了体现地域特色，二是为了呈现地域文化。上饶北部是“三里不同音、五里不同调”的山区，很

文海拾贝 还原真实

——评《孙犁佚文佚简辑录与研究》

□袁学骏

续研究，让他的眼界更加宽广。在其新著中，一部分文章是从佚文佚简入手，追述作品和书信出现的历史背景、作品产生的具体缘由。例如，《〈铁的子弟兵〉读后》是孙犁晋察冀时期评论田间诗歌的重要佚文，但一直不见原作。张占杰大海捞针，终于在国家图书馆保存的《晋察冀文艺》1942年第1期上发现了此文。喜出望外之下，他发现孙犁此文写于1940年，而田间这首首长叙事诗则发表于1941年，形成了先有其评后有其诗的现象。他探寻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诗人田间1939年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后，孙犁与之交好，田间的新作他都能最早读到。而且，两人在文艺发展方向上观念一致。孙犁认为这首《铁的子弟兵》体现了文艺大众化，读后便热情洋溢地写出了这篇诗评。

还有一些佚文佚简的追述，是从人际关系说起。例如，在《两篇佚文，一段交往》中，作者从孙犁2002年7月11日去世，《天津的石壁》第二天就发表了情深意长的怀念文章说起，追溯石坚于1940年在平西见到晋察冀通讯社编辑孙犁，进而引出了石坚当时的佚文《淡水》和孙犁的佚诗《咏水》，之后又描述他们长达62年的友谊。在《一张明信片的影响》中，他从1980年代初成名的河北作家汤吉夫说起，展示明信片上的短言，随之又叙述二人多次相见谈文论艺，引出孙犁关于小说《荷花

淀》的观点，即“我写的是人哪，是战争中的人……”，又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此乃进一步引出了孙犁文学观的佚言。

陆九渊还说过：“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今天的张占杰便是带着问题意识从事孙犁研究的，所以有所发现和辨正。他苦心找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保定育德中学的全部《育德月刊》，读到青年孙犁在这里读书时发表的四篇小说和一个独幕剧本，指出已收入《孙犁全集》的这几篇作品的一些谬误和孙犁本人记忆的错误。在关于孙犁到北平找工作时的佚文寻觅中，发现孙犁回忆说先在工务局当职员，后到一个小学当庶务，张占杰通过多方考证证明他是先当小学庶务后当职员。在这部新著中，作者也纠正了以前说孙犁是《晋察冀文艺》主编的猜测。所以苑英科在序言中，充分肯定张占杰敢质疑以前的定论并说实话，更正历史造成的或人们习以为常的差错，复原历史真相，还原更为真实的孙犁，认为这是这部著作“最大的亮点和贡献”。

张占杰进行了一次漫长的孙犁文学之旅。他以自己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持续地推进这一工作，并对孙犁的许多佚文进行精当的分析。譬如，孙犁1943年写有《鲁迅、鲁迅的故事》一书。当时兴起了学习鲁迅的热潮，孙犁便改写出这部

小的村落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差异主要体现在动词和事物名称上。我会有节制地使用这些方言。在书面表达上，我遵循一个尺度：尽可能将书面语与口头语结合起来，做到删繁就简。至于“记录”和“表达”，我认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记录”是“表达”的一种方式，它偏向于写实；而“表达”则更偏向于“我的叙述”。在写作方法上，我对客观描述有一种执念——我喜欢描写客观事物，也喜欢用客观的方式来描写事物。我更倾向于冷抒情，让事物本身说话。

记 者：您走访乡野这么多年，和不少采访对象应该已经不是简单的作者与受访者的关系了。有没有哪个人，您从一开始的“采访他”慢慢变成了“惦记他”？这种关系的变化，有没有反过来影响您的写作？

傅 菲：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受访者。2022年夏天，我陪一位法国朋友去婺源旅游，顺道去了沱川乡金岗岭，在那里认识了茶师汪师傅。他是一个非常温和、友善的人。我后来数次去金岗岭拜访他，每年都买他家的茶叶。他去高山采野生茶，守在那个“被人遗忘”也“遗忘他人”的村子里。我写下了这个村子和茶师汪师傅，文章收录在《人间珍贵》中。还有一件事让我感触很深。2025年五一期间，我去了上饶市华坛山镇东坑自然村，那里只住了两户人家——一户是鳏夫，另一户是一对赖姓老夫妇。老妇人将近70岁，我跟她聊了两个多小时，她的爱人给我泡茶，夫妻俩十分盛情。聊着聊着，我发现她竟然是我奶奶的侄女，从小被抱养给别人，一直没有和家族联系。这个发现让我触动很大：何谓命运？这就是命运。我一直惦记着这位表姑，打算选个时间再去东坑。至于这种关系的变化有没有反过来影响我的写作？应该说，这倒不至于直接影响写作本身，但它会引发我深层的思考。而深思，恰恰是散文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写作者的心里需要装满生活的原浆

记 者：您接下来还会继续扎根乡土、聚焦田野，持续推进山村人物系列写作吗？常年奔走于山野乡村，辛苦是免不了的。您一路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傅 菲：我会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乡土，开展持续的田野调查。乡村是我写作的重要领域。如何进一步挖掘乡村、拓展写作维度，把这条路走深走实走远，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常年行走在乡村，体力消耗确实不小，但我乐此不疲。在精神上，这是一个放松和排空的过程。写作者的心里需要装满生活的原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发生了非常伟大的变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到来，给乡村带来了哪些改变？乡村人现在过得怎样？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些是我很想深度了解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能对我生活的土地熟视无睹，也不能对我所处的时代视而不见。

记 者：在现在这个“人人都是创作者”的自媒体时代，您觉得散文这种文体独特的价值在哪里？它靠什么去留住今天的读者，或者说，它还能跟普通人的生活 and 情感发生怎样的连接？

傅 菲：确实，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可以及时记录、发布自己的生活状态、个人情趣、独到观察等，以表达“我在”“我观”“我思”“我美”“我趣”等。这些表达，深浅不一、良莠不齐，但正是这种多元与即时，折射出当代人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鲜活需求。留住今天的读者，散文靠的不是猎奇或刺激，而是诚意。它依然能与普通人的情感紧密相连，因为它书写的正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欢喜、忧伤、孤独与希望。

书写，是一个人表达自己在情感、审美、认知、思想等维度的重要方式之一。人的欲望是多元的，从精神层面而言，表达欲、探索欲以及对陌生世界的审视欲，都是重要的内在驱动力。书写能够深度地表达自我，读者也能通过阅读，满足自身的探索与了解需求，进而获得美的享受，滋养心灵。散文作为文学的重要文体，其价值在于呈现真善美，使读者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涤荡并润泽心灵——以“我之情”动“他人之心”，让双方都获得精神层面的高级享受，抵达心灵的自由。

散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之所以延续至今、备受青睐，是因为它回归本真、本性与本我。散文写作也是一种“在地性”写作。它从来就不是书写“圣贤”的文体，普通人的生活、命运、情感，以及他们的精神面貌与内心境况，才是散文最应关切的内容。只有走进生活的现场，采集鲜活的素材，散文才能闪耀出重金属般的光辉。

■书 评

张占杰很早就介入对作家孙犁的研究，十几年前就出版了《中国新文学传统建构中的孙犁》，近期又推出了《孙犁佚文佚简辑录与研究》。苑英科在序言中写道：“作者仿佛走在一片人迹罕至的海滩，探寻拾取那些细沙中的石子、贝壳，又把它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排兵布阵，供读者欣赏。这是多么令人惬意和兴奋的事情！”张占杰知道，虽然《孙犁全集》修订版都已面世，但仍然有不少遗憾之憾。所以，他立志要还原一个更为完整的孙犁。于是，他在教学之余，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在孙犁原始资料上寻寻觅觅。

他一次次出入于国家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的图书馆，在发黄的故纸堆中“淘宝”，还多次走访孙犁的家人以及聚焦这一领域的学者们。他先后获得孙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佚文49篇、佚简116封，共9万多字。他在此著后记中说，这种基础性功课用了十年，“辛苦而琐碎，但又乐此不疲”。可以说，张占杰就是一个勤劳的文海拾贝人。他淘捡的这些珍贵资料储存着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推进孙犁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凭借对这些资料的搜寻与占有，他便拥有了进一步研究孙犁的资料优势。

宋代学者陆九渊说：“人之知识，若登梯然；进一级，则所见愈广。”张占杰对孙犁佚文佚简的发现及其对这位作家的持

儿童文学性质的普及著作。张占杰以巨大的篇幅对它进行有关内容与形式的阐述。孙犁还写有新闻体小说《渡渡》。这是一篇精短之作，但它和《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爹娘留下的琴与箫》《芦花荡》聚焦的是同一事件。孙犁根据当时需要三次改写。为此，张占杰在刘桂慧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妇女抗战“走出之后”的共同主题，也就是“抗战与启蒙”的形象化表达。关于孙犁的文艺“大众化”理念和“民间形式”的运用，张占杰也依据新发现的佚文进行超出前人的论述。关于新时期孙犁写出的《欧阳修的散文》《远的怀念》，张占杰分析了稿件的发表过程以及编辑修改的得失，虽然考据繁琐却条理清晰。这证明，当时孙犁已经思想解放，而一些编者心有余悸，因而延误了作品的及时面世。

孙犁生前一再讲要有“见识”。张占杰通过钩沉孙犁几十年的佚文佚简，更为深入而准确地厘清了孙犁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轨迹，澄清了一些曾被忽视的历史事实，纠正了一些资料不足情况下的入云亦云，对作家孙犁进行了一次真实而完整的还原。有人说，历史还原工作就像“用所能找到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要尽可能地符合这条龙的本来面目，不多不少”。这样的工作既有挑战性，也充满了成就感。

（作者系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